

# 论丛周刊

## 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永不褪色

□ 商志晓

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非凡功能和指导意义，既为此前的历史实践所倚重，同样为当今时代所急需。

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些时隔不久的话语，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和“真理”本性，给予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以认识指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还是意识形态？是真理还是阶级宣言？是知识还是价值？这类问题的提问本身就带有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特征，由此所得到的答案也往往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无疑，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阶级宣言和意识形态，但它首先是科学真理，是具有科学性、真理性的思想体系，这是前提和根本。而能够把“阶级宣言”与“科学真理”这两个方面有机融合并同向共为的理论学说，唯马克思主义最具说服力和公信力。这既是马克思主义高明美妙之处，又是其它任何思想学说难以比拟所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关心无产阶级的现实遭遇，同时又坚守人民大众立场；既痛批资本主义弊端，又始终遵循历史前进的客观规律。它把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把携带阶级利益的价值追求与历史发展的客观目标贯通起来，把合目的性的主体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合

规律性要求协调起来，由以实现了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价值追求与规律遵循、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的高度统一。

正是建立在这种科学品质和真理属性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既为它的忠诚捍卫者和追随者由衷称颂，也迫使它的理论对手和敌人无奈叹服；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自由解放的理论旗帜，也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一切进步团体呼应历史潮流的思想灯塔。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非凡功能和指导意义，既为此前的历史实践所倚重，同样为当今时代所急需。

自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凡每一重大历史转折和重大事件出现，人们总是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以便从中获得理论启迪和方法指引。置于当今时代的现实语境来考量，我们依然会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地位，并未因时代更新而“褪色”，更未因条件变迁而“失语”，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代时空中依旧熠熠生辉。究其缘由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认识，对经济结构、资本运行、社会变迁的剖析，对事物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把握与揭示，在“世界观”意义上给予我们的全景式、普适性理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无可替代；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历史与逻辑统一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和方法论原则，实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已成为我们不断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和方法指南的不竭源泉。而从当今时代角度看，虽然时代发展迅猛激烈、时代变迁日新月异，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却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视域中，仍未走出马克思主义依据历史规律所作出的科学预测之外。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完成和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当今时代所遇到的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时代主题在深刻转换和时代特征在持续更新过程中所面对的诸多新情况、新矛盾，如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处置调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复杂化的应对策略、社会主义赢得比较优势并走向更高阶段的动因保障等，都亟需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综合分析、深度思考。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出新的理论创新和科学判断，依然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汲取无穷智慧和深刻教益。

需要马克思主义，既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更是事业发展的迫切要求。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并付诸于伟大实践之中。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 学林漫笔



## 从政的学人

□ 王学斌

丁文江、翁文灏二人，本学识渊博，安栖象牙塔，却又胸怀社稷，投身宦海，最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学人从政，难有善终，时耶？命乎？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个人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这段话写于1935年底，出自傅斯年之手，此时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野外因中毒气，不幸逝世。

傅、丁二人相识，亦是一则趣闻。1925年，丁氏出任上海总办，为军阀孙传芳出谋划策，这在政治上给其带来严重后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丁一度遭到通缉，只得避居大连，陷入一生中最低潮期。眼界极高的傅斯年虽与丁没有交往，但对他的为人处事十分敬佩。1926年，傅正在欧洲留学，当听说丁为孙传芳服务时，气得到处跟人说：“回国后我一定要杀了丁文江。”傅回到国内，傅与丁同时参加一次朋友聚会，胡适给两人介绍时，对傅说：“这位就是你想杀的丁文江。”然后又对丁讲：“这位就是想杀你的傅斯年。”两人当时之尴尬可想而知。“傅斯年要杀丁文江”，也成为民国学界的一件逸事。

傅斯年要杀的这位丁文江，为何偏偏要替军阀效劳？这与其一贯宗旨息息相关。丁氏发表过一篇其一生最重要之政论文，题为《少数人的责任》。他开门见山道：“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用他们的聪明智慧能力，向政治方面去努力，是少数人的责任。”既然如此看重少数人的责任，那么在中国，何种人才可以算是少数人呢？丁氏认定，大学生就是少数人，他们应该承担起匡扶社稷的重担；而他自己，不仅大学毕业，而且还留过洋，更是少数人中的少数。终其一生，他都以少数人要求自己，他做事的出发点是对国家有益无害，而不是考虑社会舆论对他的看法，这也是他后来辅助孙传芳的原因之一。

“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这句话恰出自终生以“少数人”自居的丁文江，所指为的“翁先生”则是民国弄学从政的另一典型人物翁文灏。翁氏之进入政坛，倒颇有些无心插柳的意味。本来，翁对政治一向是兴趣索然，不甚关心。然树欲静而风不止。像翁文灏这样的踏实肯干、不唱高调的知识分子，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敏锐地发觉，笔路知识分子的做法好处颇多，既能扩大自己的智囊队伍，又可化解批判自己的社会力量，还能“鼓励学者从政”的美名，把自己装扮成慧眼识才的明主，可谓是一举三得。况且蒋介石在物色幕僚时，格外注意宁波人乃至浙江人，凑巧翁就是蒋的宁波小老乡，而且名气特别大。所以他拍电报催促翁文灏见面。

起初翁氏一再婉拒，对政府邀请并不感冒。直到1934年2月16日，翁在武康发生车祸，生命垂危。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明白这是一个施与“皇恩”的大好时机，于是命令部下召见最好的医生抢救翁文灏。在阎罗殿走了一遭之后，翁文灏顺利脱险。武康车祸历来被世人看作翁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大都认为自此以后，翁抱着知恩图报的念头，死心塌地为蒋尽心效忠。其实，这是没有看透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属性，他进入政府工作，虽不排除有报答救命之恩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希望为复兴中华民族尽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洋身国家而不是替君卖命，这便是现代知识分子同传统士大夫的区别所在。

然而进入政府后，翁满眼所见，竟是与“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背道而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弊端，他不禁暗中改革决心。然而，奈何翁的一片爱国勤政之心无人能晓，西安事变后的行政改革建议本已见曙光，不成想败坏于政敌间的明争暗斗之手；接管经济部之后，翁本以为了有实权，可以扬眉吐气，做一些经济改革，而其顶头上司却是颟顸无能之孔祥熙，不但支持其改革措施，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他头上泼污水，改革又被扼杀。次次改革，皆化作一纸空文，怎能不让翁失望沮丧。更令翁文灏做梦也没料到的是，一生自律自爱、清廉正派，人在解放战争期间成为“一等战犯”，一失足成千古恨，为他人作嫁衣裳，此刻，没有人比他更能深刻体会这两句话的真意所在了！

建国前夕，翁文灏只得避居英国。一天，他专程去拜访老友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久别重逢，二人不禁海阔天空地畅谈起来。言语之间，翁不禁发现昔日挚友已是成果颇丰，著作等身，而反观自己，弄学从政，二十年来的辛勤操劳换来的竟是“头等战犯”四个字，而自己的地质学研究竟是荒唐已久。本行半途而废，从政适得其反，人到晚年，竟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这怎能不令翁感慨万千，黯然神伤。

虽出身自然科学，丁、翁二人却都不乏诗才。丁氏曾以诗自言其经世之志：“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与之异趣，翁氏则撰诗悔其入阁之举：“世事缘何反复争，老年静坐保清明。彩云易散玻璃脆，悟彻荣枯与重轻。”出山竟比在山清与否，学者从政能否皆悟透荣枯，自然见仁见智。不过丁、翁二人，本来学识渊博，安栖象牙塔，却又胸怀社稷，投身宦海。海内，往往波云诡谲，海外，依旧波澜不惊。出山，早知注定不归，在山，心绪终系庙堂。或许踌躇满志，难免顿挫扼腕；即使志趣豪迈，亦引喙叹一片。最后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学人从政，难有善终，时耶？命乎？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李檬

## 海上丝路建设亟须新海洋观

□ 陈奉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要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惯性陈旧因素，建立新海洋观。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

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兼具陆上与海上两种地缘优势，这样的海陆兼具优势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经过长期生活实践之后，中国获得了对海洋属性的深层认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以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更高层次跃进都有赖于对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确实，中国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时空连结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南方与北方，向未来发展延伸，给世界各国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顾及了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而不是单纯地为一己之利。中国把自己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偏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出的成果较多，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东西方通过海上交通所带来的社会重大变迁的研究更是不够。海上丝路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交通网络，像一只巨爪把沿线各国紧紧联系和聚拢在一起，涉及东西方经贸关系、物种交流、造船与航海技术、外交政策、海外移民与僧侣往来等诸多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过程。海上丝路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条航路上日益增长着东西方各国对于对方商品的不断需求，日益丰富着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研究存在于东方历史上关于千世纪之久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理解

重创，国家无法再从国外获得发展的资源，本来正当的海外商贸活动也不得不以非法的海上走私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脱离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丧失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在历史接续当中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及其时代意义，就应该突破思想上旧有的禁锢和经济上单一的发展模式，摒弃陈旧的轻视海洋的传统思维，赋予丝绸之路以崭新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农抑商”、重海轻陆和在民间形成的“以海为田”思想，都应该作为珍贵的遗产加以研究，经过剖垢磨光之后再应用于今天的治世实践。那些历史上中国没有取得海洋实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历史发展不能随意曲解与割断，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具有悠悠5000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历史的积淀极为深厚，思想的发展又极为复杂，因此鉴别、梳理与继承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如何被克服，如何建立新的海洋观，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性成长与发展的程度。现在的工作是克服历史中的一些惰性，去腐生新，把握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海上丝绸之路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形成东方历史上奇特现象，至今仍承载着东方文明的传统。今天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所承载的任务较以前更为繁重，发挥的作用也将比以前更为重大。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为了进一步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有必要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丝路予以新的总结。它昭示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积极参与世界经贸与文化交流，从国外获得发展的资源，国家就兴旺发达，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外闭关自守，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国家就发展缓慢萎缩，社会各项指标在低水平上徘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与教训。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这样写道：“中国人一直被称为

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海军在1100—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可惜的是，中国这样强大的海上优势并未成为促进航海贸易、开拓国外市场的有力工具，给中国带来长久发展。自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东西方历史面临重大转折，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发生一些变化，东西方都有条件进入近代社会。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强大的国力而在进入近代以后却不能实现再次崛起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是单一的原因可以解释的，必须从多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借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自觉。中国长期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重陆轻海、重农轻商观念不断强化，把农业看成是国力的唯一来源，轻视工业和海外商业的作用，特别是在西方大力拓海时东方国家却日益内敛，逐渐从海洋上退却，与西方外争海权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要知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加入并最终控制东方贸易体系，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贸易与武力相伴，巧取与豪夺同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逐渐变强变大成为海权的主导者。由此可引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即国家的发展有多方面条件促成的，其中对外交流与交通无疑是很重要的条件，它不仅使文明的结果在短期内实现共享，更为重要的是使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新陈代谢中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直接提高国家对外竞争力。尤其在海路大通之后，文明交流交汇的成果甚至可直接深入到穷乡僻壤。

我们反思过去并不是责备过去，也不是割断过去的历史，而是通过深入探讨彻底看清千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为当前建设海洋战略提供新的理论借鉴。经过千百年曲折发展之后，我们已经形成对海洋意义的清醒认识，进而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因此，以海为田，战略海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应成为当代和未来中国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年轻人不应拒绝崇高甘于平庸

□ 王世奇

安于现状，没有鲲鹏那种绝云气、负青天的本领，最终难免落在蓬蒿灌丛间。对此，今年103岁的杨绛先生概括得很精辟：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换言之，青年人要把逆境看成是荡去阴霾的劲风，涤去浮尘的喜雨，历经风雨终有晴，风雨过后，天会更蓝，气会更清。这正是当年傅雷翻译完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后在序言中写下的告白：“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薄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智慧、勇气和时间去追己所求、达成自我的时候，若是过早地在无意义的熬与耗中虚度，若不过是“可怜的难度”，徒留得一身闲愁。忆起朱光潜先生对一些年轻人毛病的慨叹，“太贪容易，太浮躁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真可谓一语中的。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

据报道，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达到749万人。而很多毕业生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着急”，在找工作时，他们觉得：想要往上爬就会有被梦想“拖死”的过程，现实地找个“一般”工作并不是件难事，所以，何苦去争呢？大学生刚走向社会，必然会碰到诸多不顺。这正像天有雨雪阴霾一样，展现给你的不可能全是朗朗丽日，作为一个有抱负的人，所做的应该是自己加压而克服困顿。一味“向现实低头”，并不可取。《庄子》里就有一则“鹏与斥（晏鸟）”的故事，讥讽那些拒绝崇高、甘于平庸的人，目光短浅

安于现状，没有鲲鹏那种绝云气、负青天的本领，最终难免落在蓬蒿灌丛间。对此，今年103岁的杨绛先生概括得很精辟：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换言之，青年人要把逆境看成是荡去阴霾的劲风，涤去浮尘的喜雨，历经风雨终有晴，风雨过后，天会更蓝，气会更清。这正是当年傅雷翻译完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后在序言中写下的告白：“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薄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20来岁的年龄，正是拥有最多的精力、